

# 1918 大流感在中国:传播、认知、争鸣与省思

邹贻韬

**【摘要】**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经受了1918大流感考验。1918大流感在华传播呈现“多点共生,多线同行,危害直线上升”的宏观局面,激励着多元主体随影响渐深而强化疫情反思。疫情期间,中国所受影响具有“华洋同遭,华惨于洋,华洋互传”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对1918大流感认知的“华洋杂处”属性,发育出“时瘟”“流感”认知双线。“时瘟”论与“流感”论各有千秋,前者覆盖广从而在地化信息源丰富。后者命名清晰,规避了“一词多病”的语言陷阱。带着中西医争鸣印记,“时瘟”论和“流感”论在病理识别、公共卫生措施等方面展开了多维理论交锋。两线虽互相攻讦,但总体冷静客观,将“中医存废”争鸣落实做细,丰富了这场旷世论战的思想内涵。另一面,“时瘟”论也积极吸纳“流感”论的长处,完成了实用主义的调和。相形之下,“流感”论者出于傲慢等情绪化原因,久久抗拒接触“时瘟”论者的有益成果,从而留下诸多遗憾。1918大流感期间,一批中国/在华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天下一家”的世界主义防疫理念,在疫情动态的信息交互、实务认知更新等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意义深远。

**【关键词】**1918大流感;中西医之争;全球史;医疗社会史

**【作者简介】**邹贻韬,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全球史评论》(京),2022.第23辑.169~20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博医会报》(1887-1931)之中国医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上海市社联2020年度规划课题“19至20世纪‘中国疾病’污名与中美关系的多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918大流感是20世纪最为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灾难,也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近现代世界遭受的最沉重瘟疫打击。<sup>①</sup>较为可信的估测数据显示:1918大流感肆虐全球期间,这种瘟疫共造成5000万至1亿人口不幸殒命。<sup>②</sup>人类应对1918大流感的全球与地方性互动,是一项颇具史学潜力的课题。马修·希顿(Matthew Heaton)曾基于“全球解读与地方阐释”视野观察1918大流感之下非洲的疫情与社会,提出了有益阐释框架。<sup>③</sup>而伴随着1918大流感研究的纵深化,疫情区域国别研究确已成为当代英语世界医学史研究的长期热点。<sup>④</sup>

不过,世界医学史学界对1918大流感疫情下的中国尚未形成深入研究。2005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人口学家克里斯托弗·朗福德(Christopher Langford)发

表论文《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起源于中国吗?》,参考数量不多但种类尚属多元的英文档案、报刊,初步展示了1918大流感在直隶、陕西、甘肃、新疆、湖北、上海、安徽、浙江、云南、河南等地的部分流行记录。然而此文开篇便提出欲以上列有限报道“验证1918大流感起源于中国,且一战华工是传播这种疾病的罪魁祸首”,大有曲解材料以阿附种族主义成见之嫌,因而医疗史见地极为有限。<sup>⑤</sup>此外,刘文明、李秉忠、池子华、林曦、皮国立、王敏东等中国学者曾或扼要梳理,或聚焦区域地考察过疫情在华扩散的部分节点、防治大势。<sup>⑥</sup>

1918大流感在华流行的整体格局、中国1918大流感认知的形成延展,以及1918大流感期间中国疫情的世界性表达(全球—地方互动)等关键议题仍有

极广阔的研讨空间。并且相关话题是全面理解1918大流感与中国的重要逻辑环节,直接决定着1918大流感中国经历与中国经验的书写质量。职是之故,本文拟沿着“1918大流感对华影响格局”“1918大流感期间在华各方认知”“大流感疫时及过后中国与世界思考、实践何以相联”这条逻辑主线,回望1918大流感阴云笼罩下的近代中国。问题意识方面,本文欲解开两处医疗社会史“谜语”:第一,1918年前后近代中国的(医疗)社会史图景对大流感的中国认知产生了何许影响?第二,1918大流感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标志性医疗卫生事件,对近代中国的医疗社会转型又施加了何种营力?

### 一、1918大流感在中国的流行大势与影响格局

现代疾病史研究普遍认为,1918流感大流行的开始时间至少是1918年春季,有的区域性推测甚至将大流行起点上溯至1916-1917年间。<sup>⑦</sup>第一轮可辨识的流行高峰最晚在1918年春季便已席卷中国大陆。刘静指出,“最早观察到中国流感疫情的是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的专业医学人士”,确切可靠的病例报道时间可上推至1918年4-5月间。<sup>⑧</sup>1919年《光华卫生报》刊文称南京地区“体热之流行症(去年三四月间曾有发现)”,亦是例证。<sup>⑨</sup>1918年初夏,在华外文媒体相继发文报道各地流感疫情,这也成为首批非区域性1918大流感中国疫情新闻。6月7日,《大陆报》(*The China Press*)获得大连方面信息,称“之前在天津、北平暴发的同一种流感已抵达大连、奉天及辽阳,三地数百名华人感染此病,症状与京津病例相似”<sup>⑩</sup>。可见1918年6月初,大流感已在东北、华北地区构成一次中等规模流行。6月中旬,《时报》等中文媒体亦开始生产疫情资讯,其内容罕有直言“流感”者,大体将此病泛泛论作“瘟疫”。不过从相关新闻的病情描述里,还是可以清晰看出流感的典型症状,由此判定其病种。譬如6月15日《时报》称沙市出现了一种“与上海相似”的瘟疫,“初起头疼发热,继以喘咳,四肢无力,传染极速”。<sup>⑪</sup>综合两项信息,不难认定波及沙市的疫情当属流感,而此条新闻也证明在1918年6月中旬,大流感已然扩散至长江中游腹地。

1918年9月底,美国及欧陆国家相继暴发第二波(“秋季流感”)疫情。<sup>⑫</sup>大约一个月后,1918年10月

下旬,中国各地接踵出现流感病例陡增情况,影响更广、危害更重的第二波流感疫情快速在中国肆虐开来。

10月26日,《申报》转引宁波地方媒体《四明日报》消息,称宁波、绍兴地区“各县半月以来忽发现一种时疫,头痛发热形如感冒”<sup>⑬</sup>。据此推算,早在10月初,宁绍地区便已有1918大流感疫情传播。10月29日,《北华捷报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派驻扬州的通讯人发回讯息,称“流感已经严重扰乱秋收,也出现了许多死亡病例。据泰州方面传闻,周边(受流感疫情影响)棺材供不应求”<sup>⑭</sup>。11月6日,该报又接当地线报称“流感已经传播至广东大部分地区”<sup>⑮</sup>。11月上旬,安徽西部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暴发了“流感—霍乱”叠加疫情。《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驻在六安的通讯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发现当地百姓被流感、霍乱以及一种同时发生的“营养缺失症”折磨得苦不堪言。<sup>⑯</sup>11月14日,河南怀庆(今焦作地区)通讯人向《北华捷报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寄去通讯,告知“这场世界级瘟疫已经散布至河南北部各乡村,那已出现了大批死亡病例”<sup>⑰</sup>。

以上胪列史料明确显示了1918大流感第二波疫情在中国传播的规律:其一,本次疫情起于沿海(口岸所在)省份,沿主要交通线渐次波及苏北、安徽、河南等内陆地区;第二,本次疫情的传染率、致死率虽无普查数据可供计算,但媒体对其惨烈程度的形象描述足以证明这场流行远超之前的春季流行。也正是鉴于此,1918年10月至12月间,中国各方舆论的流感话题热度显著抬升。此间大流感渐由“新闻”演化为“公共舆论”。

1918年底,中国流感第二波疫情的输入点不只分布于沿海口岸,内陆边疆“接触带”也极可能遭到输入性流感疫情的沉重打击。1918大流感期间,印度(含今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领土)是世界上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其邻近中国边境的地带亦出现了流感疫情暴发。1918年10月21日,英国印度殖民当局向国内传回情报,称殖民地西北边境省份发生了极为严重的流感疫情,疾病已经跨境影响到阿富汗。<sup>⑱</sup>11月14日,阿富汗上报的信息显示:不到一个

月内,喀布尔、坎大哈等地均已面临流感肆虐的可怕局面。<sup>①</sup>而12月初,一批跨境难民窜至马斯图吉(Mastuj),入境时已有10人确诊流感。受此影响,今巴基斯坦的领土内很快出现了新一波流感疫情高峰。<sup>②</sup>

可以肯定的是,上述英国殖民势力范围与中国新疆、西藏地区空间毗邻且往来甚密。那么,1918大流感期间中国西部边疆地区是否有类似流感的疫情记录呢?对此问题,已有学者做出了有益梳理。虽然民初新疆交通闭塞、缺医少药,大流感患者记录付之阙如,然而新疆史研究者早前搜罗的零星史料还是提示了1918大流感曾袭扰当地——1918年的南疆地区,以及1920年的罗布泊均流行过重大传染病,死伤无数。<sup>③</sup>而西藏地区的1918大流感流行,已被藏学研究者考订来源于印度。王同宇指出:疫情“最初被驿卒从印度带入我国西藏,后来那些从印度返回的藏商也发现患有流感”<sup>④</sup>。而新疆北邻俄国,刘静指出“因政局混乱,俄国难民大量涌入新疆避难”,由此亦发生了多轮输入性疫情。<sup>⑤</sup>此外,当时作为殖民地的我国港、澳、台地区分别受到来自欧洲与日本疫情的冲击,另构成了几脉长时间维系、相对独立的“流感入华”路径。

输入源及传播路径的多样性,致使中国1918大流疫情呈现出“多点共生,多线同行”的流行大势。1918大流感在华传播的历时、群体影响,又究竟是“铁板一块”还是如同传播路径一般“各有特色”?厘清该问题后,大流感的“中国认识主体”也将显露真容。

首先,1918大流感三波主要疫情在华影响有着不同于美国的“波峰波谷”。三波疫情间,中国受影响程度直线上升,见诸记载的第三波疫情(1919年底,1920年初)最为惨烈。1918年11月,有消息称厦门“约8%的人口染上了流感,也出现了一些死亡病例”<sup>⑥</sup>。这个数值大体象征着第二波疫情的平均水平。对比地看,当第三波疫情来临,中国受影响程度猛然加深。1919年11月至1920年初,青岛港口出现流疫情。此次小流行期间共接报有191人染病,致死率高达60%。<sup>⑦</sup>12月,闽南地区流疫情卷土重来,“当地多家大型棉花行因员工多数染病而被迫歇业,初步估计死亡率要高于去年的那波大流行”<sup>⑧</sup>。

同月,山西洪洞地区暴发流感。本轮洪洞疫情凶猛,对当地百姓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流行性感冒,这个地方的人们面临棺材短缺问题,棺材价格上涨了400%。风水在这里第一次被忽视了,也没有人关注葬礼是在吉日或不吉之日。由于棺材价格昂贵,加上现存物资短缺,很多死者的尸体都被裹着布直接焚烧了。”<sup>⑨</sup>

1920年初,流感大流行的“虎狼”之势丝毫不减,一直持续影响至当年3月。1月,绍兴发生“冬瘟”,患者“初染似为感受风寒,头疼咳嗽,三四日即行毙命”<sup>⑩</sup>。2月,《益世报》称奉天新民县也暴发“冬瘟症”,患者“初则头晕目眩,或呕或泄”,综合病死率高达20%至30%。<sup>⑪</sup>同月,《北华捷报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报道称自1919年12月以来,海州(今连云港)“连续三个月发生流感瘟疫,当地人认为[不祥的]鼓楼是罪魁祸首”<sup>⑫</sup>。3月21日,美国《俄勒冈早报》讲述了山东地区疫情形势:“中国方面消息称此次流疫情在短短几周内造成的死亡病例,已远超过同时期霍乱在一个夏天内的致死量。”<sup>⑬</sup>

宏观地看,1918大流感期间中国三轮主要疫情的波及面、侵害深度可被抽象成“上升直线”。这为持续甚至渐进的流感探索带来了充沛的现实激励,决定着中国的流感舆论反应、社会整体关注度会随疫情严峻而增加。在区域防疫史里,此类“疫重而知深”案例并不罕见。1918年10月底,中国红十字会赴宁波志愿队就曾因甬东一带疫情严重、屡治不成而特地延请三位医学家“雇船下乡,调查疫气之发源”<sup>⑭</sup>。因此,在1918大流感期间,“大流感认识主体”(关注大流疫情者)虽不可说与日俱增,但着实亦是在渐行庞大。

其次,就宏观态势而言,1918大流感对中国的影响,存在鲜明的“华洋同遭,洋区集中,华惨于洋,华洋互传”四项格局性特点。

1918大流感暴发后,疫情在中国不分种族与国籍地袭扰着所有居民,形成“华洋同遭”境况。譬如1919年《中华年鉴(1919-1920)》(The China Year Book, 1919-1920)记载,当年“初春时一种严重流感迅速蔓延。四月的第一周,哈尔滨出现了首个病例,超过半数的中国人、俄国人遭到袭击”<sup>⑮</sup>。

疫情期间,旅华外国人中流感聚集性病例屡见不鲜,具有明显的“洋区集中”空间特质。1919年10-11月,驻天津的意大利士兵群体间暴发了流感聚集性传播事件,多名年轻士兵在天津营内死于流感。<sup>③</sup>1919-1920年间,主要口岸城市的教会学校由于外籍教师出入频繁而成为流感“重灾区”。以《通俗医事月刊》1920年消息为例,是时上海教会学校明强中学240余名在校学生间有40余人罹患流感,发病率高达16%。<sup>④</sup>《华西教会新闻》(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的报道也证明,1919年4月重庆的外国儿童里曾有多人集中罹患流感,当是外侨儿童本人,以及家庭社交密切而引起的群体传播。<sup>⑤</sup>又据英国驻上海领事记录,1919年4月,旅居福州的德国人布伦一家曾罹患流感,属于典型的外侨家庭聚集病例。<sup>⑥</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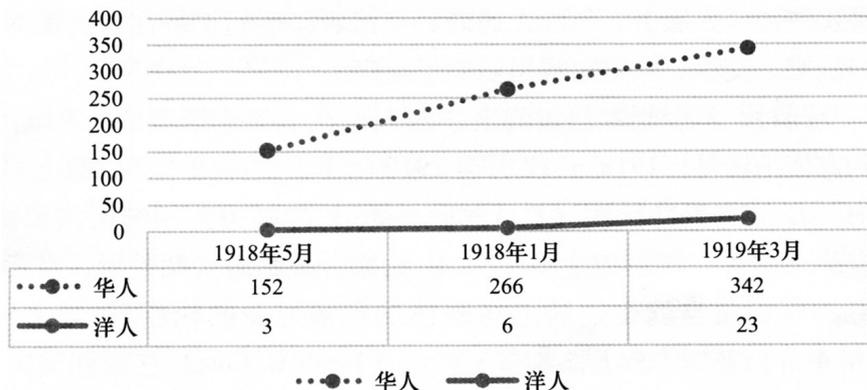
某些地区甚至有案例表明,疫情的早期传播因社会交际圈差异,会短暂集中在旅华外国人社群内,随后再传开。这中间的时差可以多至10余天。譬如1920年的一份公共卫生研究文献就谈道:“广州的流感疫情最早出现在1918年6月中旬,发现于培英中学,随后海关与博济医院、岭南学堂等地也报告了病例,其他学校则逃过一劫。这个疾病由始发现地传到其他地区,大约用了11天时间。”<sup>⑦</sup>

从存世零星统计看,1918大流感期间,华人与来华西人罹患流感后的死亡率有明显分野。总体上租界内洋人感染率高而死亡率低,华人感染率低而死亡率高,“华惨于洋”的状况尤为突出。<sup>⑧</sup>图一是据1919年《大陆报》报道整理出的“1918大流感前三波

疫情中上海租界华、洋人死亡情况”统计图。从中可见,三个流行高峰间华人病死者的增长速度也要快于洋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众多,但租界华、洋人的医药资源分配不均当是首要因素。大多数租界华人的防疫物资、意识均逊于洋人,环境卫生卫生清洁度(对肺炎发生概率有影响),以及华人罹患流感(尤其是出现致命肺炎症状后)获得医疗服务的可能性、充分性也低于洋人,由此便发生了“少病而多亡”的惨剧。

“华洋互传”是1918大流感期间中国境内疫情发展的重要表现——流感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而随着疫情持续,密集的中外人员往来也在将中国境内疫情输往海外。

上文在介绍流感输入中国时,引述史实大致皆是描述“路径”,对于海外流感何以进入中国人生活圈所言未详。此处征引海关要员包罗(Cecil Arthur Verner Bowra)日记,呈现一个案予以补充。《包罗日记》存留了1918-1919年间其家庭成员两次在华罹患流感的经历。1919年2月,包罗一家应约赴北京参访。初到北京,包罗一行就为严重流感袭扰——2月21日,埃塞尔因出现明显流感症状被迫卧床休息,22日她稍有恢复后与包罗一同外出参观,与北平要人共进午餐。当天下午在游览寺院时,埃塞尔因猛然发病被紧急送回住处,后医生证实她已发起高烧。不过包罗并未因此中止行程,他按原计划与至少八位洋员、华人名流举行了晚宴。可就在晚宴后不久,陪同包罗全天行程的诺拉突然间表现出流感症状,旋即诺拉病情恶化,“比埃塞尔的还要严



图一 1918大流感前三波疫情中上海租界华、洋人死亡情况(单位:人)<sup>⑨</sup>

重”<sup>④</sup>。这一案例生动演示了“华洋接触”给流感传播造成的可乘之机——将1918大流感带入中国人生活圈的人士,很可能是那些为洋人服务、与洋人通商、交友者。他们正是在与病毒携带者同游、同乘、交谈、共餐过程里沾染了疫病。

与此同时,不少原本健康的来华西人也在中感染流感,“华传洋”的案例亦俯拾皆是。1918年12月至1919年1月的跨太平洋航线上,美籍上海海关洋员克莱特沃西(E. A. Clatworthy)与其夫人相继因流感病亡。报纸宣称“两人已阔别故土多年”,由此综合流感潜伏期判断,克莱特沃西罹患流感处应当就是这艘上海驶往加利福尼亚的轮船。<sup>⑤</sup>与之相似,1920年4月,来华传教士雅各布·科尔(Jacob G. Cole)在返回美国的航程中感染流感,并很快因此病死于靠泊上海港的船上。<sup>⑥</sup>

通过以上考述,1918大流感在中国的传播形势及其影响格局已大体澄清。大流感“多元入华”途径,决定着中国认知本次疫情的历史逻辑实有多个起点。而“直线上升”的三波疫情又为中国各方持续关切、充分讨论大流感提供了强大外部激励。在此基础上,四项影响格局特征定型了1918大流感“中国认知”的主体内涵:“华洋同遭”意味着华人与洋人将共同应对本次疫情,不同医学流派便会因之对话、交锋;“洋区集中”却“华惨于洋”既是医疗资源分配失衡的产物,也无形间蚀刻着1918大流感的认识主体——租界作为“医疗飞地”,占有重磅信息资源,对流感的医学积累成熟丰满。因而,“洋医”在中国大流感认识里扮演着“知识生产者”角色。不过,正如“华洋互传”特征所示,1918大流感“全球史”本色,致使任何讨论该疫情的话题均无法依赖“单向度”叙事,中国1918大流感认知里亦存在着其他知识生产者,他们与“洋医”时而平行,时而交织,创生出“华洋杂处”的、极具时代和国情特色的医疗社会史图景。

## 二、“时瘟”“流感”双线认知的形成与延展

沈国威认为,近代“新”词汇的生成,是概念史与词汇史的叠合。新词汇总是在对指“新”概念的过程中萌生。对那些所谓“外来影响词”而言,新词汇时常不只“复制”源语言意涵,而是潜入多方概念“碰撞

区”,参与着特定概念认知的演进。<sup>⑦</sup>1911年,杰出科技翻译家、医学家丁福保编辑的《函授新医学讲义》辟出篇幅介绍流感。在“流行性感冒”(Influenza)总条目下,丁福保小字注解早前通行的“异名”：“博医会译作痒症,旧译作伤风时症,一名寒冒,古名天行中风,又有流行性加尔各答流行风、于七风檀法风等名。”<sup>⑧</sup>丁氏所注,形象说明在20世纪早期,“流感”之于中国不单是一“外来影响”疾病名词,更是某种本独立生长,现又接轨世界的再认知“概念”——是一项因外部科学前进、名词持续交换而深嵌于“全球在地化”结构的“成长中概念”。<sup>⑨</sup>名词如何形塑中国流感认知?这一话题委实有极为充盈的探讨空间。

面对1918大流感,中国多方依循各自逻辑,相继认定了称呼本次疫情的“名词”。刨除细枝末节差别,各方描述1918大流感的“名词”大体可划归两大流派:一方秉承中国古代医学体统,将流感大流行视作“时瘟”;另一方采纳“外来影响词”(或“流感”,或实质相等的音译名),把中国境内,以及自中国视角观察的流感大流行认定为“Influenza”。两派名异实别,并行良久,共同造成了中国1918大流感“时瘟”“流感”双线认知的整体态势。以下先行考察两派源流,以晓其来龙去脉。

### (一)“时瘟”线的形成与延展

首先梳理“时瘟”线索。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医学对“温热病”多加注意,“温病学派”学说昌明,其解析诸种瘟疫的成说亦广为散播、影响极盛。<sup>⑩</sup>“温病学派”习惯将各类流行性传染病统称为“瘟”。信奉此道者亦会以“疫”指称部分影响较广、性质模糊的“瘟”病。1918大流感期间,“遵典法祖”之传统中医及其拥趸,自然将“时瘟”之名冠给本次疫情,“时瘟”线在中国传统医学知识谱系下延展开来。

1918年秋季疫情来临之际,中国主流舆论对本轮流行的实质尚未明悉。因而当年9月、10月间,部分中方新闻仅能照着“首现地命名”机制,生造出“地域+疫”的指代名词。长三角(宁绍为最)是中国较早受1918大流感秋季疫情冲击的地域,公众对本轮疫情的了解起于新闻里的“浙江大疫”。<sup>⑪</sup>1918年10月29日,《民国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浙疫日益蔓延”的新闻,此消息将大流感“起源地”定于绍兴上虞,因

而称为“浙疫”。<sup>④</sup>11月初,上海坊间开始流传“浙疫”风言,引发不小社会恐慌。沪上各界担忧“沪埠距离嘉善不远,轮轨往来日必数起,且浙人之避疫来沪者近又甚夥”,极可能让疫情波及上海。<sup>⑤</sup>与此同时,其他瞄准次一级政区的“地域+疫”大流感指代名词也陆续见于报端。笔者对1918年10月、11月间中文报纸的大流感报道略行爬梳,提炼出了各重要新闻的疫情称法(见表一)。从中可知,10月中旬疫情初起时舆论偏向于称为“某种”瘟疫,并无特指。而10月底起,随着疫情加剧,浙江境内的绍兴、宁波、湖州等地均被“冠名”大流感。

表一的信息同时也提示我们,视本次疫情为“瘟”病者,也会使用“秋瘟”“秋疫”这般“季节+瘟疫”组词。此处“秋瘟”所谓,既是对大流行时令的概括(时间性的),又是对传统温病学派专业术语“秋瘟(温)”的使用。<sup>⑥</sup>在1918大流感流行期间,见诸舆论的“秋瘟”确实也是多出于医者言论。譬如11月1日,《民国日报》引述济南消息,称当地“发现一种时病,蔓延甚速。据老于医学者云,系属秋瘟”<sup>⑦</sup>。同样,名医曹炳章的《秋瘟证治要略》印行后,舆论引述其说而谈论大流感为“秋瘟”者更比比皆是。<sup>⑧</sup>

流感为“秋瘟”说的形构,为本派舆论注入医学“专业化”能量,也将相关报间发声自“疫灾”视角切换至“疾病”方向。顺延此脉,稍晚问世的传统医学著作在关注1918-1920年流感疫情时,也陆续挪用了其他“应景”的“季节+瘟疫”代称。有甚者,干脆由单场疫情认知反溯学理,献疑旧说对相似疾病的识别。1919年10月,有感近期“冬瘟”防治重要性增强,天津中医陈泽东在宁波出版的中华卫生公会刊物《卫生公报》上发表研究成果,对“冬瘟”旧说之粗

泛提出批驳。陈文开篇立意言“按冬温之说,世俗常言之,世人常患之,而世医亦常治之。第欲遵前人之成法,概不可得”。后续讨论间,陈泽东申明所谓“冬温”绝非伤寒,并仔细归纳其症状为“头痛、项强(僵)、身痛、恶寒、咳嗽”。<sup>⑨</sup>

值得注意的是,1918大流感期间部分传统中医词汇,譬如上引丁福保所举之“伤风”,因其已与口语俗称“伤风感冒”熔铸于一,因而也会被习惯性借作“Influenza”的直接中译名。1919年《北京大学日刊》所载《伤风预防法》开篇即言明文章所论对象是流感:“近日时症盛行于天下,死者达六百万,病者更不知其几千万人。”<sup>⑩</sup>类似于此的内容,虽有相近于“时瘟”线之名,确实属“流感”线认知系统,不当混为一谈。

## (二)“流感”线的形成与延展

作为医学名词的“流感”,并不是在1918年疫情暴发后才为中国知识圈熟悉。<sup>⑪</sup>同时,在1918年疫情蔓延成大流行前夕,美国等近代医学先进国的流感研究动态也及时补充译介入国内。譬如1918年5月,岳成就摘译了美国公卫专家鲁珀特·布鲁(Rupert Blue)的感冒防治论说,将之发表于《青年进步》,劝诫中国民众注重清洁卫生、防范各式感冒。<sup>⑫</sup>有关知识储备对1918年大流行发生后中国知识谱系迅速使用“流感”概念消化、描述疫情而言,着实是充要条件。

“流感”线区别于“时瘟”线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缘起自中国/在华各方对境外疫情的介绍。1918年10月前后,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意识到流感已在全球范围内构成大流行,流感铺天盖地占据了各国新闻的重要位置。当此之际,部分新闻渠道通畅的中国媒体及时跟进,报道了不少海外疫情动态。1918

表一

1918年10-11月间中文报纸的部分流感疫情称法

时间	媒体	称法
10月17日	《时报》	“一种瘟疫”
10月20日	《民国日报》	“剧烈之时疫”
10月23日	《新闻报》	“绍疫”
10月24日	《民国日报》	“秋疫”
11月4日	《时报》	“湖疫”
11月6日	《申报》	“浙疫”
11月13日	《时报》	“甬疫”

年9月刊《时兆月报》提及一战西线正暴发“战壕热症”，这是欧洲军医尚不明确疫情来源时对1918大流感的常用代名。<sup>⑤</sup>1918年10月27日，《时报》摘编了欧战前线的疫情报道，将大流感命名为“西班牙风邪”（与日文一种写法相同），括号注出“即流行感冒”。<sup>⑥</sup>粗算之，1918大流感期间中国海外疫情报道的主要对象国应当是近邻日本。仅笔者寓目的文献就囊括1918年神户<sup>⑦</sup>、1920年东京<sup>⑧</sup>等多次疫情暴发事件。

历史地看，1918大流感期间中国舆论对海外疫情事件的关注是相对较多的。时至1920年6月，《通俗医事月刊》登出《蔓延全世界之流行病》一文，逐条介绍了1918大流感第四波流行下的英国、美国、日本（东京、大阪）等地疫情。<sup>⑨</sup>与此同时，全球多国预防、诊疗1918大流感的新鲜经验亦被国内部分医学刊物迅速引进。笔者搜罗了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译著，呈现于表二。

一如前揭所述，来华西人是中国1918大流感叙事无法绕开的重要群体。作为“西医传华”的践行者，来华西人是如何在中国参与“流感”论之展开的？

首先，来华西人置身的全球新闻网络充当了世

界大流感新闻在华传播的信息枢纽，上海、香港两地繁荣的英文媒体动态报道了大量疫情消息。以上海为例，《字林西报》《大陆报》等发行量大、覆盖读者广的沪上英文“大报”常有海外各地流感新闻登出（见表三）。如此新闻生产一方面为中国境内的流感舆论升温；另一方面更使中国深嵌入大流感疫情信息网，不单来华西人直接阅读获得海外疫情变化，不谙英文的普通中国读者亦可在稍后中文报纸、刊物编译间汲取二手疫情咨询。这条传播链，对“流感”线的延展意义深远。

在来华西人群体内部，传教士对1918大流感的报道贡献卓著，堪称非媒体信息平台中最密集、全面反映疫情者。来华传教士们习惯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及各类地方教会刊物信息栏通告居华教友及母国重要神职人员患病、死亡情况。1918大流感期间，这些基督教在华刊物针对社群内流感疫情作了及时报道，《教务杂志》<sup>⑩</sup>《华北与山东教区新闻》（*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sup>⑪</sup>以及前述《华西教会新闻》均可见有关内容。与传教士比肩，肩负统计职能的海关（洋员）对“流感”论的落地、绵延给予了突出帮助。《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

表二 疫情期间中国医学刊物译介的部分1918大流感新鲜经验

中译篇名	译者	原发表期刊	中文发表处
流行性感冒之症状	王颂远	<i>New York Medical Journal</i>	《中华医学杂志》
流行性感冒及其疗法	王颂远	综合英语医学刊物	《中华医学杂志》
流行性感冒之注意	邝国梁	[日]《医療界の経済》	《卫生》
去年之流行性感冒症	“罗罗”	综合纽约市医官Hermann M. Biggs的若干著述翻译	《光华卫生报》《东方杂志》转载

表三 1918年上海部分英文大报的流感资讯举隅

时间	发布媒体	题名	新闻来源	首发时间
1918年10月17日	《字林西报》	流感细菌	路透社(巴黎)	10月14日
1918年10月31日	《字林西报》	英国的流感疫情	路透社(伦敦)	10月28日
1918年10月31日	《大陆报》	流感袭击了德国	路透社(阿姆斯特丹)	10月28日
1918年11月7日	《字林西报》	西班牙大流感	综合摘编自马来、日本、新加坡等地新闻	/
1918年11月8日	《字林西报》	开普敦的流感致死情况	路透社(开普敦)	10月31日
1918年11月9日	《北华捷报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	流感疫情	路透社(伦敦、开普敦) 多日新闻摘编	10月24日、10月30日、11月1日
1918年12月3日	《字林西报》	南非的流感疫情	路透社(开普敦)	11月29日
1918年12月10日	《大陆报》	流感袭击了法国	路透社“战时服务” 分支(巴黎)	12月6日
1918年12月29日	《大陆报》	新西兰流感疫情结束	路透社(惠灵顿)	12月23日

就对1918-1919年间大流感侵袭重庆地区的过程有一定描述。<sup>⑤</sup>传教士、海关的流感信息披露,直观呈现了中国疫情态势,使“流感”论有机会脱离单纯报道他国的单一局面,吸纳更多与中国息息相关的事件,借翔实素材刺激国内舆论对流感疫情投入更多关心。

此外,美国等国家驻华使领馆机构,亦通过所辖以近代生物学为知识背景的卫生调查机关,扮演了推动中国“流感”线延展的关键角色。1919年初,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专家弗洛斯特(W. H. Frost)利用该部收集的美国驻外使领馆机构报告数据,完成了《海外流感疫情》一文。当年6月该文公开发表,成为西方已知最早的世界流感疫情追踪“系年”。<sup>⑥</sup>通检这份“开山之作”,其中共有四则有关中国1918大流感疫情的记述,均摘自本地(或邻近城市)美国使领馆报告。现将涉及的条目摘抄如下表(见表四)。

当然,一批优秀的中国本土公共卫生学者也在“流感”论的生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在东北工作的近代中国著名公共卫生学家陈永汉不仅较早报道流感疫情、组织地方抗疫,还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本土医学知识平台上发布经验总结,为世界认知1918大流感献上了内容丰富的中国案例。陈永汉以中、英双语发表的《流行性感冒及其传染猪之研究》明确提到他认为“此疫不拘中外,人民同样传染”,因而其文所报道的哈尔滨滨江医院流感患者病例,是全球医学家联合战疫的有益参考。<sup>⑦</sup>

初步溯及“时瘟”及“流感”两线各自的脉源后,两线之间的差异性已有所显露。在理论认知向度上比较两条线索,它们各自的优势与短板是什么,又该如何给予两条线索以恰切的历史评价?

### (三)“时瘟”论与“流感”论的认知比较与对话基础

比较“时瘟”论与“流感”论,其各自优劣势构成了两对互补关系。“时瘟”论对疾病定名较为驳杂、模

糊。1910年代至1920年代,中国传统医学使用的“时瘟”对照着多元的生物医学词义,其中斑疹伤寒(Scrubtyphus)、流行性感冒(Influenza)、霍乱(Cholera)最为多见。而1919年7月至9月间《时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等媒体对长三角地区霍乱疫情的报道大多模糊使用“疫”“疫症”两词。若非徐相宸等医药人士就“疫症”详加解释,指明其为“干湿霍乱”,辄一般阅报者极难领会究竟何种疾病正在肆虐。<sup>⑧</sup>相形之下,“流感”论的疾病定名较清晰直接,避免了“时瘟”论的模糊怪圈。但这并不意味着1918大流感期间“时瘟”论在认知上全然落后于“流感”论:“时瘟”论植根范围更广,充分且及时地报道了“流感”论不曾关注到的地方性疫情。<sup>⑨</sup>

在肯定“流感”论同时,应当看到:“流感”论虽在对这种疾病的描述上较为清晰,但在准确诊断出这种疾病方面并无太大优势,医家论著常现鲁鱼亥豕。究其根源,20世纪初流感、肺炎、肺鼠疫三种疾病的临床表征高度类似。1918大流感暴发之际,诸多欧美医生也在此次疫情颇感疑惑,误将流感视作鼠疫者不乏其人。为便利医生准确识别流感疫情,1919年9月,《纽约医学杂志》(New York Medical Journal)约请名医总结了流感、肺炎、肺鼠疫的表征差异,供阅读者“按图索骥”施行诊断。<sup>⑩</sup>可见即便是在当时医学较为昌明的美国,清楚识别流感亦非轻而易举之事。

需要强调的是,1918大流感期间中文世界的“流感”与“时瘟”在名词上多有交缠,混用现象比比皆是。譬如1920年《通俗医事月刊》前后相衔的两篇文章分别是“美国之痒症”“日本流行病之猖獗”,前者通篇将流感称作“痒症”,后者则整体采用“流行性感冒”之名目。<sup>⑪</sup>另外,在厘辨“流感”时,某些看似更可归诸“时瘟”的表达,其实是无可争议的“流感”论描述。举例而言,直至1932年,《新医》杂志的一篇流感报道仍将流感音译为“燕虎麟沙”。<sup>⑫</sup>不知其为音译

表四

1919年《海外流感疫情》涉华内容一览

时间	地点	疫情描述
7月27日	重庆	重庆出现疫情,该城一半人口受到影响
9月28	汉口	(疫情)在汉口大规模扩散
10月1-7日	长沙	长沙报告首例流感患者
11月2日	广东	流感在广东肆虐

者极容易被字面形象迷惑,错认之为“时瘟”类表述。因此,在划分两条线索各自进路时,仍当潜入名词表象之下,考镜其医学认知基础再作决断。同样,部分深浸于西方科学氛围的中国刊物在描述1918大流感时也会运用“时瘟”线的表意资源,两者间并非风马牛不相及。1919年4月,留美学生会编辑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转载了展现疫情期间美国贝尔维尤医院(Bellevue Hospital)患者拥挤不堪的新闻照,图注解说:“百欧弗由医院去冬肺炎疫症及伤寒症流行时病室内拥挤之情形。”<sup>⑥</sup>由此,区分两条线索亦不能以科学“倾向”为准绳。

更须留意的是,遵照“时瘟”线者与沿循“流感”线者并不各自为营,而能够充分互相理解。浙东中医曹亦电研究1918大流感专著《秋瘟证治要略》的前言介绍:“考此类疾病,实最初发生于西班牙,今且蔓延全球,美医遂名‘西班牙流行病’。据芝加哥《美国医学会月报》云,西班牙流行病,近来大肆其威,欧洲各部分,无论文野,皆不获免。”<sup>⑦</sup>由此足见疫情期间开明中医充分吸纳了西方流感研究成果(即便后者不完全正确)。先举出“流感”论者理解“时瘟”论者的一则案例:1918年11月7日,蔡廷锴在写给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 Jordan)的信内提到,“自我返回上海以来,这里阴雨不断,气候潮湿,但不是很冷。此城已出现很多流感病例”<sup>⑧</sup>。此处引文中的“流感”出自译文,原信使用的是“时瘟”类描述。两条线索间的互相可识,为后续双线对话辟除了障碍,意义匪浅。

### 三、“时瘟”“流感”双线的认识交锋与实践整合

前已述及,1918大流感期间中国认知的“时瘟”与“流感”对话模式是多态的,既囊括互相识别、理解的“软”对话,亦常见围绕流感检明与诊疗的理论交锋,即矛头互指的“硬”对话。“时瘟”“流感”双线缘何针锋相对,曾怎样对峙舌战,又是否有在理论交锋之外,以改良医疗实践为标的实践整合? 以下我们就逐条考析这三个问题。

#### (一)双线的认识交锋

1918大流感期间及后疫情时代,围绕此次疫情的“时瘟”与“流感”交锋持续颇久。两条在理论上长期平行的线索何以在舆论场里针尖对麦芒? 起到决定影响的因素,或许是“中医存废”争鸣与两线

发生、延续过程在时间及目标群体两方面均高度重合。<sup>⑨</sup>于是,带着“中医存废”争鸣印记的双线交锋击鼓开战。<sup>⑩</sup>

“时瘟”论与“流感”论交锋的基本表现,是中西医围绕1918大流感认知及防治思想反复唇枪舌战。而激起千层涟漪的那块“落水石”,其实是当时两线间存在的互不清楚对方医学原理这一本源性的瑕疵。大流感期间,近代生物医学对中医的冷嘲热讽铺天盖地,自不消多说。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传统中医及其信奉者亦曾质疑西医所述流感病理,结合国内编译的海外小道消息炮制出独特的“流感病原解释”:1918年11月5日,一篇题为“中国流感认识”的文章言称“中国人认为这种疾病的根源是整个世界的空气均被欧洲使用的瓦斯、炸药给污染了”<sup>⑪</sup>。如此阐释和传统中医对病与“气”因果关系的认知有直接联系,体现了传统中医以“时瘟”常识消化“流感”的思考方式。

“时瘟”论者与“流感”论者是如何互相攻讦的? 且先展示近代著名“中医存废”话题人物余岩(云岫)的两次发言,再现“流感”论者对“时瘟”论的一类典型批评。1928年《新医与社会汇刊》刊发了余岩撰稿的《流行性感胃之危险及养生法》。该文囊括了“前废止中医案时代”余岩对流感病症认识过程中中西医关系的审视态度:

流行性感胃之为病,自民国八年世界大流行之后,上海一区年年有小流行,未尝断绝。今年忽又盛行,身病发热,极似仲景所谓太阳伤寒。其间三四日而热退病愈者固不少,而老人、幼儿以及衰弱之人往往将息,不慎变成肺炎,气促心麻而死者颇不乏人。叶香岩所谓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转心包者或即指此。其实流行性感胃变成肺炎后,往往陷入无欲状态,此乃黏膜杜塞,支气管空气呼吸不足,血中碳酸郁积,而中毒也。更有所谓神经型者,亦往往嗜眠。入春以来,老弱幼稚之丧生于流行性感胃肺炎者为数极多,余深悯之,特掇拾见闻,著养生要言以告病家,庶几防患未然,稍免枉死之鬼乎?<sup>⑫</sup>

引文中的下标点线为笔者所加,细察这些文句,1928年前后余岩对中医流感认知并不持全盘否定态

度,而是积极促成近代生物学对中医病案的原理诠释,在两者间构成有效对话。然而在1933年,已成为“废止中医案”灵魂人物的余岩又在《医学革命论二集》内一改调子,严厉批判了疫情期间部分中医只知温病而不识本次瘟疫即为流感的“一叶障目”：“流行[生感冒等病,旧医方案皆指为温。然皆有菌,皆能传染,彼此互证,可以实验而知,安得旧医谓之温非热性传染病乎?”<sup>⑧</sup>余岩语气的加重自一个侧面表明：“废止中医案”风波前后,1918大流感“时瘟”论与“流感”论在病理认知上的差异,被挪用为反对者诟病中医“病理学不健全”的一大口实。

传统中医阵营并不被动挨骂。疫情期间,某些防疫救人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医也以两线交锋为契机,大方直言本派优势。1920年,蒋璧山自荐《伏瘟证治实验谈》对中医药污名之匡正有积极意义。他首先认定此著的理论根源绵长：“灵素圣经厚自有,凿凿可证”,由此推及“医学上之价值中精密而西粗疏,中高深而西卑浅也”的论断。<sup>⑨</sup>随后,蒋氏又从“性价比差距”切口申明传统医药对1918大流感等急症救济有重大意义：“西医血清之制造必待临时,而又难猝办。今春闻每人注射至愈,必需银数百两之多,价值太昂,而难施于贫病。如一时无觉,惟有坐视其死而已。”<sup>⑩</sup>

公允地看,“时瘟”论者与“流感”论者的互相攻讦总体上是冷静、客观的,比起同时代未能就事论事、高呼口号的“废止派”或“保存派”,他们真正基于实际案例(并且也是最新鲜事例),将“中医存废”争鸣落实做细,极大丰富了这场世纪论战的理论内涵,也以实证气压制了空谈者点燃的虚无、民粹主义魔焰。<sup>⑪</sup>

中西医围绕病理认知交锋的背后,近代中国公共卫生起步阶段“科学落地”的医疗社会难题大白于世。公共卫生学是“流感”论者应对1918大流感的主要工具。在上海公共租界等近代生物学掌握的“医疗飞地”,公共卫生举措给小范围内有效防范1918大流感的目标提供了一定帮助。然而在1918大流感期间的中国,当公共卫生溢出“医疗飞地”界限,诸般错配使得其反映传染病、遏制大流行的功能陷入瘫痪。<sup>⑫</sup>“时瘟”与“流感”双线认知间围绕公共卫生体系的话语交锋由此肇端。

二者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第一类交锋,落在了对都市生命统计事业的理解、执行上。<sup>⑬</sup>1919年4月9日,《新闻报》称“英文沪报云:现在春时已到,天气渐暖,且渐干燥。流行性之感冒,即俗所谓‘痒症’者已见消灭,此后当不致再有发现”<sup>⑭</sup>。查阅日期相近的主要在沪英文报纸消息,最可能成为《新闻报》此讯内容来源的,当属《大陆报》4月8日刊发之《华人中流感正在减少》。核查《大陆报》原文,直译是:“上周华人患流感而死亡者大幅减少,卫生官员报告因流感而去世之华人为57人,仅为再上一周的一半不到。”<sup>⑮</sup>对照观之,《新闻报》明显是带有臆断色彩地过度解读了《大陆报》所载生命统计报告。《新闻报》讯息虽冠有流感之名,实际上更接近“时瘟”线的模糊特质,与恪守“流感”线的《大陆报》分歧突出。

在都市生命统计的执行层面,两线知识错位触发的影响愈加显明。1919年3月5日,淞沪警察厅长命令各辖属区所“限期查报去秋感冒症”,起因是“美国红十字会来函,调查世界各国一九一八年秋冬间患染流行性感冒病者及死者人数,拟编制详细报告,以咨考证”。在表明“为何调查”后,淞沪警察厅也告知属下执行者“如何调查”,着重阐明了“何为流感”：“查上年秋冬之交,发现流行性感冒。此病初起时发热、头痛、身疼、咳嗽、多痰,间有咳血。转入肺炎,或致神经迷乱各症状。”<sup>⑯</sup>之所以调查组织者要特别说明流感症状,是因为普通警察(包括兼职生命统计的一般警察),以及受访对象(包含大批执业中医)普遍更熟悉本土的“时瘟”论,对“流感”论所知甚浅。与上海同时,天津警察厅也接到了调查流感疫情的命令。在此之前,当地各县知事业已奉命草草敷衍过一轮——“时疫均未填表报告”。深感不满的上级遂将流感疫情调查任务直接委派给天津警察厅。厅长张韵樵接令后要求属部即刻调查,并在五天内回报结果。令人咋舌的是,再次“调查”后,天津警察厅给出的鉴定意见仍旧是“实无此项病症发生”<sup>⑰</sup>。细究天津此次懒政的原因,除却因扰近代中国的基层政治乱象,调查人员及受访者不熟悉“流感”线,错将目睹流感疫情归至“时瘟”诸病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恰如1936年“玄妙观主”在《流行性感冒之特殊疗法》绪言时里对读者的叮嘱:“我国无此(流感病患)统计,然

死于此者盖比比也。”<sup>⑧</sup>

此外,大多数“时瘟”论者对近代公共卫生措施缺乏认同,这点推动着公共卫生领域的两线交锋逼近高潮。1919年6月,阎锡山为山西省抗击鼠疫总结册《山西省疫事报告书》作序。阎序生动描绘了当时“中医”“西医”在公共卫生考量上的巨大裂痕,其情景与1918大流感之下的两线交锋高度类似:“征之经过事实,西医之说不为无据。然自此说传至吾国,精于中医者争欲以旧说胜之,谓隔离诸方法为极残忍之举。人民深信其说,遂隐而不发。东三省前有火庐焚尸之事,绩见者深惧,闻者益疑,惜财之心甚于惜命,防检愈形棘手。若拘中医之说,贻误必多。”<sup>⑨</sup>

某种程度上说,依托“中医存废”展开的病理认知交锋只是冰山一角。由于1918大流感是瘟疫(大流行),而非单纯个体疾病,因而双线认知交锋的“主战场”其实是两者于公共卫生领域内的认知深浅与观点分歧。

## (二)双线的实践整合

在实践层面,理论认知上对冲交锋的“时瘟”论与“流感”论,是否亦以互相攻讦为唯一对话模式?征诸文献,在抗疫实践层面上,“时瘟”论者曾积极吸收“流感”论的病理识别精准等优点。由此,两者在实践中局部地化对峙为整合,展开了务实的互鉴对话。

传统中医与西医流感诊断有何关系?1930年《杏林医学月报》刊发的《流行性感冒之史的研究》对此有过精辟阐述:“Influenza,是一七三三年医学家 Gagliasdc(加里亚地)氏命名的。虽然中土没有这个名词,但是外感风寒症,时行伤风症……名词,却是有的。不过,内容相同,而名称略有差别而已。”<sup>⑩</sup>可见,至少就大势而言,传统中医与西医均能在日常施诊中识别出“流感”,并各自建立了“流感”治疗方案。鉴于此,“时瘟”论者可直接将其学说里有关“流感”的研究积累对照至“流感”线,反之亦然。<sup>⑪</sup>

1918大流感暴发前后,传统中医向掌握较高病理分析、外科手术技能的来华西医求教已较普遍。即便是在当时较为偏远闭塞的西南地区,传统中医积极吸收近代生物医学知识的情况也屡见不鲜。1919年5月,《华西教会新闻》(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选登的一封致医疗传教士公开信就表示“曾

在药铺工作三年’、‘对中医理论深有了解’的人‘想要[向传教士们]学习一些外科知识’”<sup>⑫</sup>。

1918大流感在全球大流行之际,开明中医群体很快通过医界刊物、新闻媒体获悉了生物医学界对本次疫情的基本判断。某些有志清除流感的中医当即充分消化了相关西医研究,将之灵活化入自己的“时瘟”诊疗。其中,浙东中医曹赤电是杰出代表。他在《秋瘟证治要略》(以下简称《要略》)中感叹:1918大流感在浙东地区泛滥实乃“由于人士不讲未病卫生,医家不知共同研究所致”。他诚恳地承认了自身的不足之处:“我中医之诊断,惟察痰涎、便尿,因缺乏显微镜无从检查,亦一缺点。”<sup>⑬</sup>此外,《要略》第七章还迈出传统中医界限,传授了多条借鉴自西方近代公共卫生学的“秋瘟预防法”经验。《要略》劝诫人们在疫情期间要多食用新鲜蔬果、戒烟以不至于“变化血液与脑神经”、饮用净化且煮沸的开水、“衣服被褥宜时常洗换”、居室“洒扫洁净,不可容留污秽物”。此外,曹赤电还特别援用近代西方公共卫生学的隔离规范、化学消毒法,提醒民众注重防疫:“以上皆为时疫流行时,人人所宜知之常识。”<sup>⑭</sup>1935年,中央国医馆湖南分馆学术整理委员会的王松如在《温病正宗》一书内高度肯定了1918大流感期间浙东中医界的研究贡献。《温病正宗》就此给出的赞词恰切地赞许了曹赤电对“流感”论的积极借鉴:“曹炳章之《秋瘟证治要略》……或辑旧说,或抒心得,或参西学,皆切于实用者也。”<sup>⑮</sup>

揆诸史实,1918大流感期间“流感”论者似乎并未正视“时瘟”论者快速响应、施救有方的专业能力,而是将之前积累的对传统中医的不屑一顾贯彻始终。<sup>⑯</sup>“流感”论者是否真具备足够应对能力,可以问心无愧地俯视而非平视“时瘟”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虽然1918大流感疫时,特别是疫情后半程期间世界范围内的流感病理研究突飞猛进,但西医错误流感致病菌的问题仍未得到修正,相关医疗力量应对流感的实际举措也很是捉襟见肘。直至大疫前一年的1917年,来华西医推荐给感冒患者的主导药方还是“慢火熬煮葡萄浆液并服用之”<sup>⑰</sup>。1918年底至1919年初,美国专家从波士顿美军中招募了一批志

愿者进行流感致病源对照实验,同时越过前期环节,在志愿者身上紧急测试可能存在的流感“特效药”,结果即便采取了如此激进的研发策略,“疗愈流感的梦想”仍未能遂愿。<sup>⑩</sup>在华西医对流感治疗也是几近“束手无策”:1919年3月8日,上海租界卫生部门的流感预警指出“流感是一种很难有效施治的疾病,一般都要‘经历完全病程’。对患者最重要的照料方式是让他安卧休息,这样或许能够避免肺炎发生”<sup>⑪</sup>。不只缺药,在1918大流感发生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医学界对流感认知其实存在极大盲区。1915年《大陆报》一篇报道在回顾近期美国“恶性感冒”时指出:“直到最近,感冒才被医生认为是传染性的,而普通家庭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sup>⑫</sup>在公共卫生预防层面,“流感”线也颇显得力未能逮。1919年3月15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官、公共卫生学博士阿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在《二月卫生报告》内总结了他自国际同行渠道得知的,也即当时来华西人能采取的全部流感防疫措施:“限制聚集、开展公众预防宣教、在医院与家庭中尽早隔离患者、佩戴口罩”,斯坦利特别强调“这些是目前我们仅有的被证明有效的举措”。<sup>⑬</sup>

1918大流感期间,“流感”论者对“时瘟”论有益治疗经验的漠视,使得一些本有望康复的近代生物医学诊疗对象错失生机。而在侥幸逃过一劫者中,又有不少只是“喝葡萄糖浆、卧床休息”的病患本可以通过中药调理缓解疼痛、改善体验。据此可见,在瘟疫面前,不同医学体系的务实交融方才是治病救人的根本之策。医学该当跨越流派隔墙,医疗理应消弭成见界限,唯其如此方能战疫克难,佑护黎民苍生。

与疫情期间来华西医冷漠对待中医抗疫成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医学界在1918大流感期间、疫后持续充分学习了“流感”论的抗疫长处。可以说,1918大流感这场旷世大疫既是近代生物医学中国在地化实践的重要载体,也是对此项进程持续深化的猛烈刺激。1918年疫情暴发短短十载后,中国基于近代生物医学理论的流感应对已趋向成熟。1928年,孙粹存发表《流行性感冒之预防及治疗》,借外国医学家论断提醒中国医者、民众注重公共卫生防护,根除流感传播渠道:“瑞士学者谓其传染之起因于

*Luftmiasmen*,口鼻为传播之路。家庭、公寓、学堂、兵营、音乐会、戏园、教堂等处传染最易。”<sup>⑭</sup>1929年3月,浙江省内以海盐县为原点暴发了流感。民政厅长朱家骅签发4913号令,谈道:“前据海盐县县长呈报时疫流行,业经本厅委派专员前往,查明在案。兹据复称,此项时疫系属重症流行性感冒。”在4913号令中,朱还指示各县从速分发防疫布告,强化防疫准备。随后,朱家骅又签发了5602号令,要求省内各医院“如有此种传染病患者迅即报告市县政府,并希协同防治。所有到院请诊患者详细症状、门诊或住院人数、隔离治疗中经过情形暨死亡数目仍随时呈报”<sup>⑮</sup>。公允地评判,纵使1918年后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细化下沉的执行力度尚很薄弱,但历经1918大流感及疫后持续学习淬炼的中国部分地区卫生管理,已与同期欧美设计别无二致。

#### 四、疫时与疫后省思中的“世界主义”

作为近现代世界历史上首场全球性瘟疫,1918大流感对人类的冲击普遍且深远。方才迈入全球化时代门槛的人类通过1918大流感,开始渐行领悟到孤立主义明显拖累了全球性瘟疫防控的实践效果。流感肆虐全球之际,尤其是疫情的世界性面相得以广泛呈现于舆论之时,一些具有远见卓识者痛定思痛,向孤立主义笼罩下的疫时世界投去世界主义光亮。其标志性言论,当属1920年2月西门·福来克斯纳(Simon Flexner)对全球同行及普通民众发出的诚挚呼吁:“发动终结流感的世界之战!”福来克斯纳号召所有地球居民齐心协力共同致力于消除流感全球大流行。<sup>⑯</sup>在这场疫时思想大变局里,中国/在华各方人士与世界先进潮流多有同频共振,“天下一家”的世界主义观念处处留痕。

旷世大疫震醒了乐观过度的西方医者,也令中国国内心系全球联系下国计民生的仁人忧心忡忡。于是,一批意识到全球疫情面前无人可独善其身的清醒之人相继投书媒体,表达对全球一体化防疫的由衷关切。1918年11月1日,邵力子在《民国日报》发表“时评”《全世界流行之感冒》。择要叙述前几月中国流感疫情后,邵氏呼吁:“盖以今世交通便利,疫症之流行至速。故有此种现象,已成为全世界注意之问题,汲汲求防止之策。吾国民亦不当淡漠视之

也。”<sup>⑨</sup>疫情暴发后,陆军军医学校的毕业生们积极响应防疫,1918年底该校校友会编纂的联谊杂志选刊了数篇军医界校友流感著述。其中,教官俞树棻提纲挈领的平议尤显视野宏大:“震动全球之恶性感冒猖獗于世,一发之势,有若飘风。不问洋之西东、种之黄白,几侵染所有人口之半。”<sup>⑩</sup>1922年,来华西医创办的《时兆月报》也站在全球医学近代化的视角上进行了深切反思:“诂料我人正思世界无疫症得以安全之时,一古来未有之疫症猝而发现,世人对之惊恐万状,犹如二百年前之人对于当时疫症情况也。”<sup>⑪</sup>

真切感受到流感全球大流行的压力后,部分中国医家迅速响应,在流感知识生产中贯彻世界主义。1919年12月10日,《时报》所附“医学周刊”栏目刊出余云岫的《流行性感疗法集腋》。余岩自称此文写作契机是“一年以来世界各国大师名家已稍稍积有实验,见诸学报。我国独无医学专报,乡僻医师与夫大都通邑之应诊忙碌,耳目未能闻详,岂非医界一大缺憾!”<sup>⑫</sup>余氏此论说明他笃信1918大流感是东西融通的全球性疾病,而西医前沿研究理应尽快为中国医者熟知,从而把印在海外纸面上的药方,及时转化成本土治病救人的医疗实践。与之相似,同在1919年见刊的一篇卫生研究谈道:“伤风症几乎围裹全球,且为人所常患的。去年此症在世上已共杀了有六百万人,因此须当谨慎预防。……去年当此症在美国流行极盛时,人民虽细心研究如何医治,但终不能完全收效。由此足证阻止此病之传染比医治病更加紧要。”<sup>⑬</sup>

在华的外来人士亦曾在疫情期间公开发表立足“共同体”思想的协同抗疫主张。1919年8月12日,来华医疗传教士芒森(E. H. Munson)在福建基督教教育协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教育机构能为解决中国健康问题做些什么”的主旨演讲。此讲稿后来被改写发表于《教育季报》。文章洞察了1918大流感带给世人的“全球健康一体化”巨大震撼,呼吁以此次疫情为新起点,积极推进“全球观”指引下的在华医疗服务事业:

世界已变得比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更紧密了。在相对较短时间内,西班牙流感几乎遍及全球各地。一个国家的流行病可能在个把月内传播到极为遥远的国家,共同安全已成为个体安全

最可靠的保障。考虑到这些因素,只有国际卫生才能保证世界各国的总体健康。我感到很欣慰,大会能安排出时间让我们来思考“中国的国民健康”这一重大问题,以及它对这些天我们所谈论的“前进运动”之显著影响。<sup>⑭</sup>

1918大流感之所以在全球流行肆虐,其突出症结是各主要国家间未及时充分互通疫情信息,没有形成共同防疫。正是鉴于痛彻教训,信息共同体成为疫情反思起步后多方优先关照的实务选项。1918年底,一位中国医生梳理道:“近来中国发现一恐怖事,即报载各处流行病是也。浙西豫南等处蔓延极广,死者甚重。即就上海一方观察,自上春以来,时作时辍。闻此次流行病蔓延之广,不啻欧亚两洲,全球几将遍及。”<sup>⑮</sup>1919年,美籍来华西医嘉惠霖(William W. Cadbury)以华人助手赵克成笔录口述的形式写成《流行性感症论》,发表于《博济》杂志。文章开篇立意时着重强调了这篇“中西合笔”的流感研究通论,也是中国地方与全球疫情信息交互的产物:“此段专详论今年羊垣及附近各方与乎地球上别处所发生之辛症。”<sup>⑯</sup>随着信息交流网络的进一步扩散,医学界之外的信息平台亦扭转风气,践行起疫情信息共同体。至1919年12月山东潍县暴发流感疫情时,《大陆报》的通讯员已能够主动前去县府等单位调阅乡里呈报的流感统计公文并据此撰写新闻。<sup>⑰</sup>这一方面说明针对流感的新式生命统计事业快速下沉布局,编织起点线联动的流感疫情监测网络;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华媒体对中国本土疫情防控的程式化采写有所改观,由以西人传闻作信息源的疫情琐谈,变为以中国“地方性”做背书的疫情跟踪,将中国疫情统计深度整合入抗击大流感的全球信息共同体。此后,受全球舆论对流感动态高度敏感的导向浸染,中国媒体持续深入参与全球流感信息共同体实践,及时准确地报道了几场大规模流感疫情的动态,为主动防疫赢得时间。譬如1936-1937年,在日本暴发的流感经由海路传入上海地区,《上海日报》《健康》《光华医药》等沪上报纸杂志第一时间刊布消息,准确描述了日本流感疫情,配套介绍了1918大流感以来科学界认知流感之大体进展,并提醒读者做好流感大流行期间的个人健康防护。<sup>⑱</sup>

1918大流感及之后近代中国针对流感的医疗(学)的世界主义实务认知,也在内外刺激下迅速铺开。1920年,中医界最重要两部1918大流感研究著述之一的《伏瘟证治实验谈》印行,蒋璧山声明写作动机是“近世车轨四通,疾病新出者今有而古无。理虽一致,法颇万殊,非多临症不能有发明,非多读书不能穷究竟”<sup>⑧</sup>。在“序言”里,《伏瘟证治实验谈》首位传阅者、蒋璧山老友翁汝梅总结了本书的现实、长远意义。翁序称《实验谈》近看是对“未申两岁冬春之交,伏瘟盛行,死亡相藉”的救急应对。而自医学适应“近代化”的角度评判,《伏瘟证治实验谈》是对“近世市舶交通,种族复杂,感受异气,怪病丛生。病机日出不穷,治疗亦杂糅不一”时事新象的积极回应,是一项具有世界眼光的创新成果。<sup>⑨</sup>1919年9月,《广济医报》发表陈省几撰稿的《药方类:流行性感胃》。陈省几在文末附识言“以上诸方均述自英国 *Pharmacal Advance*(《药学进展》)医报。此医报虽为极佳,然所列成方其用药之理由未详。兹每方后所述理由均由译者自注”<sup>⑩</sup>。可见当时导夫先路的中国西医绝非被动接受生物医学流感治疗方案,而是积极以学术主人公姿态投入相关研究,化身为疫时构筑全球齐心战疫的中流砥柱。

1918大流感期间及疫后一段时间,医疗卫生孤立主义及针对特定国别的疾病污名舆论在全球蔓延。<sup>⑪</sup>由此观之,中国/在华各方的克制、专业、团结疫情认知与表述,以及携手同行的战疫作为堪称一脉乱世清流,也是斯时世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一种定力、潜力积蓄。然而让人叹惋的是,囿于语种及文化交际偏见所限,当时中国“双线”认知里的多数观点只作到了“引进来”,未能全面“走出去”,构成医学知识与抗疫实务的世界环流。因而客观评价,1918大流感期间及疫后中国战疫观点的“世界主义”更多还是理想层面的,相较洛克菲勒研究所专家等优势话语而论,其历史意义仍是区域、内向的。

### 结语

通过本文的考述,开篇所列两条“谜语”的“谜底”已水落石出。首先,1918年前后近代中国的(医疗)社会史图景对大流感的中国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华洋杂处的医疗格局、中西医对峙的时代气氛、

中医对温病深入研究以及近代公共卫生学说传华的知识基础皆形塑着中国的1918大流感知。本质上讲,中国的1918大流感双线认知既是疫情使然,又的确是疫情对近代中国医疗社会进路的投影;其次,1918大流感作为人类历史上标志性医疗卫生事件,对近代中国的医疗社会转型施加了重磅营力。其着力点是鞭策近代中国以更开放包容的对话姿态全面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由此,1918大流感不独影响了中国,更在卫生变革向度上深刻改绘了近代中国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这既是中国人文积淀与当时医疗社会国情的历史结果,也是此后中国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的优秀思想传统,其最基本要义是“世界同心,携手战疫”。

### 注释:

①1918大流感研究堪称世界医学史乃至社会史领域的绝对“显学”,学术史梳理恐难以在一则脚注的有限篇幅内完成。故暂且从略。据笔者有限阅读积累,除近年出版了中译本的几部1918大流感著述,以及学界耳熟能详的《被美国遗忘的1918大流感》(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 The Influenza of 191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等名著外,英语世界还有两部1918大流感宏观研究有较高参考价值。见 Nancy Bristow, *American Pandemic: The Lost Worlds of the 1918 Influenza Epidemic*(Reprint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Arthur Franklin, *The Spanish Flu: History of the Deadliest Plague of 1918*,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2020。

②Niall P. A. S. Johnson, Juergen Mueller, "Updating the Accounts: Global Mortality of the 1918-1920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76, No.1, 2002, p.115.

③Matthew Heaton, Toyin Falola, "Global Explanations versus Local Interpretations: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19 in Africa", *History in Africa*, Vol.33, No.1, 2006, pp.205-230.

④美国、日本、印度、法国、英国等国度的1918大流感疫情历史均可找到相关研究,讨论美国、日本者更是不胜枚举。其中,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的《被美国遗忘的1918大流感》堪称该领域代表作。

⑤Christopher Langford, "Did the 1918-1919 Influenza Pandemic Originate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31, No.3, 2005, pp.473-505.

⑥参阅刘文明《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及其全球性传播》，《全球史评论》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秉忠：《关于1918—1919年大流感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6期；池子华、郭进萍：《中国红十字会救治1918年浙江时疫述论——以〈申报〉为考察中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林曦、李永宸：《1918年大流感视阈下的绍兴时疫与社会救济》，《中医药文化》2021年第1期；皮国立：《民国疫病与社会应对——1918年大流感在京、津与沪、绍之区域对比研究》，《新史学》2016年第27卷第4期；王敏东：《流行性感冒的名称——以1918/19年的大流行为中心》，《东吴外语学报》2012年第34期；但就整体而言，1918大流感在华传播的源头、路径及影响仍未澄清，需要调动更多史料予以细化考订。此外，吴文清对《申报》1918大流感有关史料的辑录（笔者认为其中部分内容是否属流感当存疑）值得关注。见氏著《〈申报〉所见中国1918至1920年大流感流行史料》，《中华医史杂志》2020年第4期。

⑦Mark O. Humphries, "Paths of Infection: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War in History*, Vol.21, No.1, 2014, pp.55-81.

⑧刘静：《1918年大流感在华传播路径、范围和程度新探》，《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⑨《三翻四覆之流行性感冒》，《光华卫生报》1919年第6期。

⑩"Advices from Dalny", *The China Press*, June.7, 1918, p.13.

⑪《沙市之瘟疫》，《时报》1918年6月15日，第11版。

⑫[英]凯瑟琳·阿诺德：《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田奥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6-19页。

⑬《救治宁绍时症类志》，《申报》1918年10月26日，第3版。

⑭"Flu at Yangchow",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Nov.9, 1918, p.17.

⑮"Flu in Kuangtung",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Nov.9, 1918, p.23.

⑯"Flu in Anhu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Nov.21, 1918, p.10.

⑰"North Honan Ravages of Influenza",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Nov.23, 1918, p.19.

⑱"Diary No.85299(1918.10.21)", *British Library Collection*, Number: IOR/L/MIL/17/5/4111, p.28.

⑲"Diary No.91544(1918.11.14)", *British Library Collection*, Number: IOR/L/MIL/17/5/4112, p.17.

⑳"Telegram No.187-M(1918.11.26)", *British Library Collection*, Number: IOR/L/MIL/17/5/4113, p.5.

㉑陈健：《民国时期新疆疫病流行与新疆社会》，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大学，2005年，第9页。

㉒王同宇：《1918年江孜大流感的传播原因及其影响概述》，《中国藏学》2020年第2期。

㉓刘静：《1918年大流感在华传播路径、范围和程度新探》，《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㉔"Flu Reaches China", *The Times-Picayune*, Nov.29, 1918, p.5.

㉕"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1912-1921), volume I-Northern and Yangtze ports, Peking: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p.230.

㉖"Flu Epidemic", *The China Press*, Dec.17, 1919, p.6.

㉗"Caskets Jump In Price In Shansi, Due To Influenza", *The China Press*, Dec.28, 1919, p.5.

㉘《冬瘟流行》，《时报》1920年1月28日，第6版。

㉙《新民县发生冬瘟症》，《益世报》1920年2月1日，第3版。

㉚"Hai chow's One Pride: A Sacrifice to Influenza",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Feb.14, 1920, p.20.

㉛"Flu Severe in China", *Morning Oregonian*, Mar.21, 1920, p.11.

㉜《救治绍疫近讯》，《民国日报》1918年10月31日，第10版。

㉝The China Year Book(1919-1920), print in Shanghai 1921, p.503.

㉞"Flu Takes Italian Soldiers at Tientsin", *The Shanghai Gazette*, Nov.8, 1919, p.1.

㉟《流行性感冒渐多》，《通俗医事月刊》1920年第4期。

㊱"Chungking Notes",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21, No.4, 1919, p.38.

㊲"China: Repatriation of Enemy", *Foreign Office Archive*, FO.371/3680, pp.332-334.

㊳W.W. Cadbury, "The Pandemic of Influenza As It Affected Canton", *Medical Record*, Vol.97, No.10, 1920, p.391.

㊴1918大流感期间，部分在华外国组织因切断对外通道，实行封闭化管理而小范围实现流感“零感染”，形成了“卫生孤岛”。当年驻扎于天津的美国陆军第十五步兵团(15th U.S. infantry)便“逃过了本次流感袭击”。见"Weston Boy Escapes Flu in Tientsin, China", *East Oregonian*, Jan.8, 1919, p.8.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1918大流感期间来华西人的流感防控实际上述说着浓重的“卫生帝国主义”。

㊵"365 Deaths Last Month Traceable To Influenza", *The China Press*, Apr.4, 1919, p.1.

㊶"Cecil Arthur Verner Bowra. Memorials of the Bowra Family: Part III", Vol. II (1918-1919), p.183.

㊷"Visitors from China Fall Victims to Influenza", *Morning Oregonian*, Jan.4, 1919, p.1.

⑬ "Missionary to China is Victim of Influenza", Wilkes Bane Times Leader, Apr.26, 1919, p.1.

⑭ [日]沈国威:《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⑮《传染病之警告:流行性感冒》,《函授新医学讲义》1911年第12期。

⑯高晞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1908年《高氏医学辞汇》经博医会名词委员会审核通过出版,‘上病下辜’成为‘传染病’的标准译词”。而这个字并非横空问世,是“高似兰从康熙字库里发现”的“一个既可以直接明了地表示新学说,又与人们通常熟悉的‘染’字词义有差异的生僻词字”。这与近代中国的流感命名大有相似之处。参阅高晞《疫病的现代性: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认知嬗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⑰皮国立:《湿之为患:明清江南的医疗、环境与日常生活史》,《学术月刊》2017年第9期。

⑱皮国立:《民国疫病与社会应对——1918年大流感在京、津与沪、绍之区域对比研究》,《新史学》2016年第27卷第4期。

⑲《浙疫日益蔓延》,《民国日报》1918年10月29日,第10版。

⑳《上海之浙疫谈》,《益世报》1918年11月2日,第6版。

㉑赵绍琴等编著:《温病纵横》,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

㉒《秋瘟到处猖獗》,《民国日报》1918年11月1日,第2版。

㉓邹贻韬、顾学林:《〈秋瘟证治要略〉探讨》,《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㉔陈泽东:《冬温(寒疫附)》,《卫生公报》1919年第40期。

㉕《伤风预防法》,《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第362期。

㉖据笔者初步梳理,“流行性感冒”名词(含系统概念阐释)译介入中文的时间不会晚于1911年。当年付梓的《函授新医学讲义》《谦信药报》等刊物已明确出现“流行性感冒”这一词汇。而在此之前,《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已于1895年、1896年、1897年这三年间,四次在“medical and surgical progress”版块上发文介绍流感研究动态。感谢何翔钰师弟帮助统计!

㉗布鲁(Rupert Blue)著,岳成编:《感冒之危害及其疗治》,《青年进步》1919年第17期。

㉘《战壕中之热症》,《时光月报》1918年第12卷第9期。

㉙《国外近电》,《时报》1918年10月27日,第3版。

㉚《时鉴:国外大事记》,《复复》1918年第34期。

㉛《日本流行性感冒之患病及死亡数》,《通俗医事月刊》1920年第2卷第3期。

㉜《蔓延全世界之流行病》,《通俗医事月刊》1920年第6期。

㉝譬如1918年12月刊的“死亡”栏便记有当年11月11日威海卫传教士、传教士子女因流感不幸离世的消息。见 "Deaths", The Chinese Recorder, Dec.1918, p.830.

㉞譬如1919年1月,此刊同一版内先后通告了“传教士布

鲁因罹患流感过世”“祖国主教登基因流感疫情而被迫推迟”这两则消息。见 "News", 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 Vol.27, No.1, 1919, p.4.

㉟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1912-1921), volume I-Northern and Yangtze ports, Peking: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p.246.

㊱W. H. Frost, Edgar Sydenstricker, "Epidemic Influenza in Foreign Countries", Public Health Reports, Vol.34, No.25, 1919, pp.1361-1376.

㊲陈永汉:《流行性感冒及其传染猪之研究》,《中华医学杂志》第8卷第4期。

㊳《治疫大研究》,《民国日报》1919年8月29日,第8版。

㊴以《北华捷报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为例,1918年11月9日报道了广州、扬州、泰州三地疫情(简讯),1919年2月22日、3月15日两次连续披露了上海流感大流行状况(深度采写),总体而言对地方疫情讯息关注甚少。

㊵"Progress of Medical Science", Medical Record, Vol.96, No.12, 1919, p.514.

㊶《通俗医事月刊》1920年第6期。

㊷劲夫:《燕虎麟沙又来了》,《新医》1932年第10期。

㊸《照片》,《留美学生季报》1919年第6卷第2期。

㊹曹赤电著,杨杏林点校:《秋瘟证治要略》,见杨杏林、梁尚华主编《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三册·温病)》,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页。

㊺"China: Baron Sakatani Appointed as Currency Adviser to Chinese Government(Nov.7 1918-Dec.28 1918)", British Library Collection, Manuscript Number: IOR/L/PS/11/150, P 1824/1919, p.2.

㊻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㊼理应强调的是,1918大流感期间传统中医的诊治能力因地域与流派差异有着霄壤之别。细言之,宁绍地区因医家研究较透彻且温病治疗经验积累丰厚,因而疗效甚佳。而在北方部分地区,譬如山东潍县,传统中医就对1918大流感毫无招架之力。1918年《大陆报》的消息便批评“潍县周边西医不发达的地方疫情更为严重”。见 "Influenza Virulent Through North China", The China Press, Nov.12, 1918, p.2.

㊽"Chinese View of 'flu'" Aberdeen Journal, Nov. 5, 1918, p.4.

㊾余云岫:《流行性感冒之危险及养生法》,《新医与社会汇刊》1928年第1期。

㊿余云岫:《医学革命论二集》,社会医报馆1933年版,第14页。

㊱蒋璧山:《伏瘟证治实验谈》,三三医社1920年版,第

10页。

⑫蒋璧山:《伏瘟证治实验谈》,三三医社1920年版,第10页。

⑬章原:《从〈申报〉论说文看晚清中西医之争》,《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⑭有关近代中国“医疗飞地”的相关内容,可参阅高飞《“帝国医疗”的“飞地”:1942年上海华界霍乱流行与汪伪市府的应对》,《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9年第3期。

⑮邹贻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都市生命统计》,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学刊》第2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05-231页。

⑯《痒症流行病之消灭》,《新闻报》1919年4月9日,第9版。

⑰ "Influenza Decreases Among The Chinese", The China Press, Apr.8, 1919, p.16.

⑱《限期查报去秋感冒症》,《民国日报》1919年3月6日,第10版。

⑲《伤查有无疫症发生》,《益世报(天津版)》1919年3月19日,第7版。

⑳玄妙观主:《流行性感冒之特殊疗法》,新学书局1936年版,第1页。

㉑山西防疫总局编辑处纂辑:《山西省疫事报告书》,中华书局、大林斋1919年版,第2页。

㉒绿苔:《流行性感冒之史的研究》,《杏林医学月报》1930年第17期。

㉓皮国立:《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中华书局2019年版。

㉔ "C. C. Elliott. An Open Letter to the Missionaries of West China",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21, No.5, pp.13-14.

㉕曹赤电著,杨杏林点校:《秋瘟证治要略》,见杨杏林、梁尚华主编《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三册·温病)》,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183页。

㉖曹赤电著,杨杏林点校:《秋瘟证治要略》,见杨杏林、梁尚华主编《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三册·温病)》,第199-201页。

㉗王松如:《温病正宗》,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印,1935年,第23页。

㉘陶飞亚:《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

㉙ "To Cure a Cold", The China Press, May 6, 1917, p.28.

㉚ Sidney A. Weston. The World: A Field for Christian

Service Student's Text Book Course XII (Part II), Chicago: The Pilgrim Press, 1919, p.86.

㉛ "The Order of The Mask",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Mar.8, 1919, p.626.

㉜ "Frederic J. Haskin", Onlya Cold, The China Press, Jan.28, 1915, p.6.

㉝ The Municipal Gazette Being the Official Organ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Volume XII, 1919, No.610-No.667, Shanghai: Offices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19, p.75.

㉞孙粹存:《流行性感冒之预防及治疗》,《新医与社会汇刊》1928年第1期。

㉟《公牍(卫生):浙江省政府民政厅训令》,《浙江民政月刊》1929年第17期。

㊱ "Drs. Flexner and Copeland Urge World Fight to End Influenza", The Sun and the New York herald, Feb.15, 1920, p.5.

㊲力子:《全世界流行之感冒》,《民国日报》1918年11月1日,第11版。

㊳俞树棻:《此次流行恶性感胃之病原及豫防》,《陆军军医学校校友会杂志》1918年,第33页。

㊴《流行性感冒症》,《时兆月报》1922年第17卷第1期。

㊵余云岫:《流行性感冒疗法集腋》,《时报》1919年12月10日,第13版。

㊶苏:《卫生须知:伤风》,《时兆月报》1919年第2期。

㊷ E. H. Munson, "What Can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Do to Help in Solving the Health Problems of China", Educational Review, Vol.7, No.1, 1920, pp.11-12.

㊸心逸:《痒Influenza之疗治法》,《广济医报》1918年第3卷第6期。

㊹ [美]嘉惠霖述,赵克成译:《流行性感冒症论》,《博济》1919年第15期。

㊺ "Influenza Epidemic Hits Shantung City", The China Press, Dec.19, 1919, p.5.

㊻《日侨多恶性感胃》,《健康杂志》1937年第4卷第6期。

㊼蒋璧山:《伏瘟证治实验谈》,三三医社1920年版,第4页。

㊽蒋璧山:《伏瘟证治实验谈》,三三医社1920年版,第2页。

㊾陈省几:《药方类:流行性感冒》,《广济医报》1919年第4卷第3期。

㊿陶飞亚、邹贻韬、杨恩路:《美国1918大流感溯源的污名化与科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